

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针对建国后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和骄傲自满情绪等不良现象,报告要求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因此,邓小平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问题,“就是把党的全国、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报告获得大会通过并且修改通过了新的党章。这样,根据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此,中共八大实际上是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再加上形势的变化,这种思想和制度并没有能够真正得到贯彻执行。除了八大二次会议以外,八大并没有举行过其他全体代表会议,中共此后再也没有召开过类似的会议。所以,八大就成为了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召开过两次全体代表大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接着又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中,赫鲁晓夫告

过去数百年来,中俄(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接触交往史,充满恩怨情仇,亲密时不妨“同志加兄弟”,疏离时又为对手乃至敌人,个中是非,谁能轻易说得清楚?

追根溯源“尼布楚”

两国之间最近一次诉诸武力的激烈争执,已是快半个世纪前的事了。1969年3月,为了争夺乌苏里江航道上面积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的控制权,双方边防军队爆发战斗,并各自宣称对方率先挑衅,而已方最终得胜。

随后,关系早就破裂将近十年的中苏之间,再次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际论战,除了意识形态之争外,焦点更多落在两国边界划定的“历史遗留问题”上。追根溯源,则还要回到珍宝岛之战发生的280年前,中俄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上——那是中俄两国军队首次正面交锋(1685-1686年,通称“雅克萨之战”)的结果。

中方传统上认为,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俄方称《涅尔琴斯克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而且是历史上中国签订的第一个对外条约。但俄国方面不这么看,无论是其官方还是学术界,都质疑《尼布楚条约》的“平等性”,坚信当时俄方代表是在清朝优势兵力的胁迫之下,不得不签约放弃由他们开发的阿尔巴津(即中方所称“雅克萨”,位于黑龙江与额尔齐斯河交界口岸岸辖区的大片土地)。

俄方历来主张,中俄发生直接的边界接触以前,两国之间的广阔地带为无主土地。波雅科夫、哈巴罗夫(均为17世纪中叶前后进入黑龙江流域的俄国殖民军首领)等“新土地开拓者”,只是将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地区和平并入俄国。现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便是为纪念哈巴罗夫而命名。

在急于东扩的俄国人眼中,长城是中华帝国北部传统的社会文化分界线,而位于阿穆尔河以南500公里处的柳条边(清政府为维护祖宗“龙兴之地”而修筑,防止汉

独一无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老木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主席台

诉毛泽东:“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这使毛泽东十分兴奋。他回答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依据是,他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再过十五年,英国钢的年产量可从现在的两千万吨增长到三千万吨,而中国再过十五年可能达到四千万吨。胡乔木后来回忆:“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是全国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过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八届二中全会、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随后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

杭州会议(两次)、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点名的国家领导人之外,一般还有中央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区的第一书记,在各次会议上,毛泽东主要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他多次对“反冒进”思想进行批判,而在1956年曾坚持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多次作了检讨,各种生产指标被不断提高,1958年5月2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全会讨论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议程、代表团的组成和大会主席团的组成。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中央委员会向第

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特别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报告说: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微小的,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1956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40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而结果是损害



1958年的宣传画

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报告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强调“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主张同样是很明确的,即应该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

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报告时,还加了一段:“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从五月八日开始,陆陆续续进行了十天的大会发言,发言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先后在5月8日、17日、18日、20日、23日作了即兴讲话,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破除迷信、国际国内形势、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等问题,阐释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等概念。毛泽东讲要破除迷信思想,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要把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丰富的智慧、创造能力解放出来。毛泽东的讲话极大的鼓励了大家的热情。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陈云再次就“反冒进”问题做出了检讨。这样,从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到这时候到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从实际工作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意见受到严重挫折。“左”倾错误不可避免地迅速蔓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

清代以来的中俄关系:蜜月与雾月

叶柏川(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专治清代中俄关系史)



人越界北迁),是满洲帝国的北部边界。他们声称,清朝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地区,同时开始向蒙古、西藏、朝鲜及“俄国的阿穆尔地区”扩张,故清朝时期中国边疆最终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将邻国并入自己的版图”。

由此可知,中俄双方对共同边界地区历史归属的截然不同的认知,由来已久。

“平等”与否各说各

自19世纪中叶前后起,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国力大大衰弱,而俄国则日益强横。他们趁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北京,清廷岌岌可危之际,迫使中方先后签订《璦琿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从俄国人的角度看,他们“收复”了17世纪末期失去的土地,即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留在俄国一侧的阿穆尔河左岸”。

换言之,中国人视为丧权失地、奇耻大辱的上述两大不平等条约,俄国方面反而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平等条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奉行国

际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1919-1923年之间,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连续发表三次“对华宣言”,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三次宣言的具体内容有所出入,但苏俄关于两国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界定,却是与沙俄前后一致的——苏俄政府认可的“不平等条约”,只限于《中俄密约》(1896年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和四次日俄密约(1907-1916年签订,目标是瓜分在华利益)。而中国被迫割地赔款、损失极其惨重的《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等,统统不在此列。

1949年中共执政后,迫于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及意识形态倾向,采取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政策。长达10年的中苏“蜜月期”里,彼此的边界分歧与历史积怨,在公开场合及媒介宣传口径上,自然能淡化就淡化。但从根本上说,双方对此争议问题的认识与态度已根深蒂固。

20世纪60年代,中方提出边界谈判倡议时,苏联坚称两国不存在领土争议,中方则明确重申,当时涉及中苏边界的19个条约,都是不

平等条约,苏方应承担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但中方也表示,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状况,仍愿以这些条约为基础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在此前后,中苏爆发激烈的大论战,再由论战而热战,以至于在珍宝岛兵戎相见,边界与领土纠纷的“心病”,实在是“难言之隐”。

三百年来著述史

珍宝岛之战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苏进行了三轮艰苦的边界谈判。随着最为普通公众瞩目的两国间最后一块争议领土——“黑瞎子岛”(黑龙江、乌苏里江汇



合处冲积而成,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时被苏军占领)的归属尘埃落定,2004年10月14日,双方签

署《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5年6月2日,两国政府互换批准书,上述协定正式生效。从法律层面上讲,中俄之间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走向,总算全部确定。

三百年来关乎民族尊严与国家利益的争执,至此是不是皆成往事了呢?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2006年,笔者到莫斯科参加“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期间,正值中国国内的清史纂修工程全面启动。会上,一位俄国学者就提出,中国学者在撰写清代中俄关系著作和文章时,应慎重对待两国边界与领土的历史纠纷议题。笔者参加另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间隙,一位俄院士级别的学者,看到笔者正在阅读一本中国台湾学者所作学术专著里,涉及“沙俄侵华”的章节,还愤愤然地当面说,这样写是“违反两国2001年签订的《睦邻友好条约》”的。

反过来讲,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还是中国民众的心目中,沙皇俄国巧取豪夺中国15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事实,又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学术界在此绕不开的历史情结上,也不能不表明和坚持自身的立场。

当前,中俄关系无疑又处在新一轮的“蜜月期”,出于对国际局势稳定及两国民众福祉的考虑,我们当然希望这样良好的关系,能稳定维持和延续。因此,如何更恰当地处理敏感而微妙的“历史遗留问题”,确实需要两国官、学、民各方的共同努力。

1. 外交官们努力扮演鸽派,但不能真的让自己变成“鸽子”,以为只有通过和平手段才能解决问题;军人明白自己是在扮演鹰派,但也不要以为做了鹰派就不顾及国家利益,非要用战争来解决。军人的鹰派色彩和外交官的鸽派色彩是一种搭配,皆服从于国家利益。
——针对近期关于中国外交

工作的“鹰派”和“鸽派”之争,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少将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提出,外交官应当是“假软弱”,不能是“真软弱”,软弱是换不来利益的,而军人不能是“假强硬”,而是“真强硬”,二者相辅相成才对国家有利。

2. 对于我而言,我的背景就是中国。这个经受了无数苦难与灾难的国家,为她的子民源源不

断地提供了极其独特的创作资源,我的作品是独特的,只能发生在中国,但它涉及的主题寓意全人类。

——日前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如是说。

有意思的话